

加强大学声誉管理至关重要

——访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挪威国家科学院院士汤姆·克里斯滕森

记者：关于组织声誉的研究最早出现于企业界。1983年，美国Fortune杂志调查并公布了100家最受尊敬的美国公司，在商界和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后，许多学者都投入到对公司声誉的研究中。目前，对“大学声誉”也没有专门的、严格的定义。在您看来，什么是声誉管理？

汤姆·克里斯滕森：声誉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但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将其定义为一组关于组织的能力、内涵、历史和使命的信念，它嵌入在组织内外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网络之中。大学的声誉管理是系统性地使用符号的过程。为什么大学要进行声誉管理？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学需要建立一个正面形象，在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建立组织合法性。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社会学家批评奥斯陆大学，他说：“在哈佛大学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比奥斯陆大学一年发生的事情都多。”他的话也许不那么友好，也许并不正确，但当一所大学和全球排名第一的大学进行比较后，它如何提升自己？有趣的是，大学往往以声誉管理为起点，往往会通过使自己看起来非常现代化来进行声誉管理。

记者：当前，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大学的竞争不仅是硬件设施和科研水平的竞争，更是以品牌和特色为特征的声誉竞争，是现代大学在竞争中取胜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大学声誉管理研究逐渐兴起的原因。您认为大学声誉管理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汤姆·克里斯滕森：在大学声誉管理的驱动因素中，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大学的社会嵌入性在提高。现在社会嵌入性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是指大学嵌入到社会中的程度。这是一个你可以“感受”到的概念，因为你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当我在1975年开始大学生涯时，很少有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大家都是在办公室里做研究。但是到了21世纪，一切都不一样了。过去二十年间，我每年都会参加十余个国际学术会议。这说明学术合作日趋关键，嵌入性更加重要。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与其他主体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也导致它面临来自全球、国家和本地的更大压力。为了看起来像一个“真”的大学，大学必须拥有许多种正式的组织机构。斯坦福大学近年大量的研究是关于这些正式结构的传播方式的。尤其是美国的学校，作为全球领先的大学，经常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学校模仿。这种组织结构的模仿和传播会导致大学的同构性，即这些大学拥有类似的组织结构。虽然实质不一定相似，但是在表面上，这些大学是相似的。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所现代化的卓越大学，大学会设置一些与之前不同的组织机构，比如，将“信息部”改名为“交流部”，这更加体现社会嵌入性。

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的“大学排行榜”已把大学的“学术声誉”、“社会声誉”列入考察范围。例如，由《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推出的大学排行榜设有“学术声誉”这一指标，中国科学评价中心推出的“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榜”设立了“学校声誉”指标。您是如何看待排行榜对大学声誉管理的驱动作用的？

汤姆·克里斯滕森：卓越驱动和排行榜是一些比较特别的驱动因素，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每所学校都想成为卓越的学校，那到底谁是卓越的呢？另一个问题是，排行榜并不总能反映真实情况。此外，其他驱动因素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包括研究者和学生的国际市场、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国内外的政府机构。大学内部的教授、管理人员和学生同样也会产生驱动作用。现在大学在为学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这使得大学投入巨大。如若在这方面减少

投入，就吸引不到学生。

记者：大学声誉是大学的客观表现在人们心目中的主观反映，那么，这种主观能通过哪些符号鲜明有效地传导给社会公众呢？

汤姆·克里斯滕森：我认为，大学的声誉管理有四种核心符号。第一种符号是绩效符号，是指大学标榜自己所获得的实质性成就。比如，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名、两名或四名诺贝尔奖得主，它会把这个信息公开在官方网站上，宣传它是一所极好的大学。第二种是道德符号，是指大学宣传自己的开放性、包容性、性别平等价值理念，通过包容多元文化来提高声誉。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下，这种符号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我会告诉自己的学生，他们是纳税者缴纳的税款支持了他们的教育，因而他们应该回馈社会。但是在有的大学，老师会告诉学生，学校会为你们提供非常好的机会和人际关系，因此以后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成为有名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国家的道德符号是完全不同的。第三种是职业符号，是指一些技术、职业素质和责任感方面的符号，比如大学宣传自己发展某个学科是为了承担国家责任。第四种是合法符号，是指法制化，即通过施行正确的程序来提高声誉。但是许多大学在这方面都做得不太好，比如许多大学在招生时没有正规的程序，甚至歧视某些学生。

记者：就如您所说，任何大学在声誉管理方面都会注重绩效符号、道德符号、职业符号和合法符号这四个核心符号。但是由于制度和文化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大学在运用这些符号时会有什么不同吗？

汤姆·克里斯滕森：的确，不同国家和不同大学的声誉管理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些区别既包括结构性区别，也包括制度性区别和文化性区别。我们比较中国、挪威和美国的大学声誉管理模式，可以得出有趣的结论。

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声誉符号主要是绩效的和职业的，道德符号较少。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学往往较少宣传学校的开放性或包容性，更多通过实际的产出进行声誉管理。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是评判一个中国大学的重要标准。不同排名、学科、规模、校龄的大学，使用的声誉符号差异很小，这与挪威和美国完全不同。但是理工类、规模较大、校龄较长和排名靠前的大学，使用绩效的声誉符号更多。

美国大学的声誉管理则有所不同，经常使用职业的声誉符号，而不常使用绩效的声誉符号。这是由于职业符号与学校的历史相关，因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在这方面非常重视。不经常使用绩效符号的原因是，这种声誉符号可能不利于大学发展。比如大学标榜自己就业率较高，但可能是由于毕业要求较高，所以会使一些学生放弃进入该大学。相对普通大学而言，美国的顶尖大学使用各类声誉符号的频率更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很多大学避免过多谈及评估过程的细节，因为这只会让人觉得他们没有想像中的卓越。

对于挪威的大学而言，更常使用道德符号。相对于个人主义，挪威更加认同集体主义与平等主义。挪威并不过度追求卓越，因此道德符号更加适用。专业化的高校使用各种声誉符号的频率都很高，但是年轻的学校一般习惯于使用道德符号。这是由于这些学校并没有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没有值得炫耀的方面，因此只能通过道德宣传来进行声誉管理。比如，有的学校会宣传：“来这里是非常好的，你可以来这所学校学习到很多社会技能，参加许多学生活动和聚会。”这些宣传并不涉及你能够学到的真正知识。

记者：通过您的分析，我们看到不同大学在声誉符号的运用策略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声誉管理会有不同侧重。这是否意味着，大学声誉管理在国内外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对影响大学声誉的各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能为大学的声誉积累和建设提供建议吗？

汤姆·克里斯滕森：是的，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大学健康发展的根基，因此加强对声誉的管理和研究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美国化，并效仿美国大学进行声誉管理。不同的声誉管理无所谓高低优劣，其背后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差异。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大学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声誉符号。对这种理性选择进行解释与探索，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本采访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程伟整理）

——2019年5月9日《社会科学报》

高水平本科教育的中国方案正在形成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是新时代高教战线的重要使命。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必须在战略上统筹谋划、在战术上抓好落实，推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的“质量中国”品牌。

谋划好高水平本科教育的中国方案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内涵式发展，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将原先的单个计划变成系列计划的组合，由“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发力”，标志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成型成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跟随跟跑转到部分领域并跑领跑，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写好“奋进之笔”的一次“质量革命”，体现了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新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作为新时代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打造高等教育“质量中国”的战略一招、关键一招、创新一招，推动本科教育全面振兴，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一是立足新时代，强化担当意识。要把强化担当意识作为人才培养工作的首要要求，用“四个意识”导航，用“四个自信”强基，用“两个维护”铸魂，紧紧扭住“两个根本”，牢牢把握“提高质量、推进公平”两大时代命题，真正担当起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新时代责任。

二是面向新变革，强化战略思维。要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需求，加快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域的人才培养，更多样化、更综合化、更集群化、更智能化、更国际化，推动并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

三是创造新模式，强化创新精神。要强化创新精神，按照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守正创新的原则，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高等教育中站稳脚跟。

四是提升新内涵，强化质量效果。要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做到标准先行、评价护航、文化为魂。

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攻坚战

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2019年-2021年，教育部将分三年全面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

划2.0,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一个总体部署

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 提高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新工科是主动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手棋”, 要着眼“新的工科”和“工科的新要求”, 加强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提升国家硬实力。新医科是构筑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础, 要聚焦大国计、大民生, 实现从服务治疗为主到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全覆盖, 助力提升全民健康力。新农科要贯彻“两山”理念,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升级涉农专业, 提升生态成长力。新文科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要把握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 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是“四新”建设的总抓手, “四新”建设是“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总目标。通过计划的实施, 引导高校全面优化专业结构, 深化专业综合改革,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项核心任务

面向所有高校、所有专业, 全面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建设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一流基地。

建金专, 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面向全体高校、全部专业, 鼓励分类发展、特色发展, 在不同类型高校建设一流本科专业。

建金课, 实施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建设10000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和10000门左右省级一流课程, 包括具有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线下、线上、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各类型课程。

建高地, 建设260个左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一流基地。2019-2021年, 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天文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心理学、基础医学、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17个学科, 分年度实施建设约60个左右文科基地、200个左右理科和医科基地。

一次质量革命

通过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 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的“质量中国”品牌, 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不是单一的改革项目, 而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 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新定位和全面提升。高校参与“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一是必须全面落实“以本为本、四个回归”。坚持立德树人, 切实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 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着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二是积极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紧扣国家发展需求, 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健康中国、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形势新要求, 着力调整优化专业建设, 开展课堂革命, 引领人才培养方向。三是不断完善协同育人和实践教学机制。积极集聚优质教育资源, 优化人才培养机制, 着力推进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办

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强化实践教学，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和社会满意度。四是努力培育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质量文化。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建立健全自查自纠的质量保障机制并持续有效实施，将对质量的追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深刻的根本性变革之中，必须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到2021年建设布点完成的时候，把“六卓越一拔尖”计划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将完全形成，“两个根本”将得到有效落实，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供稿）

——2019年5月21日《光明日报》

加快高校国际化转型升级

高校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2015年，我国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双一流”建设；2019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两份文件再次提出“分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等系列目标。可以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内，推动我国高校向国际化转型将成为一项重点工作任务。本文从“教育外交”角度入手，指出通过发挥高校在“教育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加速“高校对外交往”，可以大幅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化转型速度。这也是加快“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手段。

外交学认为，外交和军事、安全等类似，属于“高政治”（High Politics）层面范畴，是展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舞台。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交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拓展，已经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低政治”（Low Politics）议题。越来越多的领域都和外交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领域外交。领域外交是指在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指引下，在传统的政治安全之外的各个部门或专业领域的对外关系。教育外交就属于领域外交之一。其中，高校由于在国家教育中独特的地位和性质，具备了介入领域外交的特点。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将传统的外事管理工作延伸，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高校对外交往”。未来，为实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战略目标，我国高校可以进一步借助教育外交，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加快国际化转型步伐。

通过高端访问提升高校国际影响力

在现代外交活动中，国家或国际组织领导人在出访时，经常会选择访问所在国的高校作为外交活动重点场所，通过发表演讲、举办讲座、开展对话等形式，与高校师生进行沟通交流。对于国际政要来说，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向公众和媒体深入阐述和传播自己的政策和观点，还能深入所在地与青年进行面对面直接对话，营造正面形象。对于高校来说，鉴于这些国际政要在国际媒体上的高曝光度，接待高端访问活动不仅可以直接大幅提升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还能带动引进各类资源。

从近年实际情况分析，我国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

的诸多知名高校，都接待过多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媒体上赢得了较高关注度，并因此获得了相关资源支持。因此，对处于向国际化转型的我国高校来说，可以主动寻求与有关国家政府和使领馆及国际组织机构联络，以最大诚意吸引国际政要前来访问交流，努力营造良好国际形象。

提高办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当前，我国高校一般均开设了外语类专业，每年培养出大量通用语种和小语种人才，但实际上对于高校的国际化转型并没有发挥出较大作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国际化人才培养工作力度。

首先，大力吸引国际学生入校就读，提升国际学生数量和所占比例。国际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国际生源数量和比例。以美国为例，2016—2017年美国高校连续接纳了100多万名国际学生，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知名高校的国际学生均超过1万名。近年来，国际学生来华留学数量一直在增加，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共有48.92万名国际学生在我国高校学习，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10%以上。随着国家的大力支持和高校实力的增强，国际学生来华数量会继续稳步增加。我国高校应抢抓机遇，积极加强对外宣传，努力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在吸引国际学生过程中，高校应重点抓好国际青年精英人才培育，提升其对我国高校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助力高校国际化转型升级。以北京大学为例，当年在校期间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穆拉图·特肖梅与北大结下了深厚情谊。在担任埃塞俄比亚总统后，穆拉图·特肖梅作为杰出校友，多次在重要场合推荐和称赞北京大学，为提高学校国际声誉作出了贡献。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年轻时曾在武汉大学进行本科学习，对武汉大学有着特殊感情，曾三次回母校访问，极大提升了武汉大学在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形象。可见，高校加快做好国际学生引进和培养工作，对国际化转型将大有助益。

其次，着力开展国际培训工作。以哈佛大学为例，其肯尼迪政府学院等每年都针对其他国家政府或企业的中高级职员开展专题培训。英国牛津大学会面向非英语母语国家的教师，提供英语教学培训项目；爱丁堡大学会向部分国家政府官员提供培养进修机会。这都极大提升了高校自身形象。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共建，我国高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国家有关部委、机构和行业协会合作，积极介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界、教育界等人士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培训，并通过他们实地培训体会后的经验扩散，形成良性循环。

最后，提升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等相关专业教学研究水平。当前，我国有近百所高校开设了相关专业，与占比较低相比更需要提升教学研究水平。培养出高质量的专业人才，不仅可在未来外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更容易吸引海外国际学生就读。这些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可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交往的重要力量，有力提升高校的国际影响力。

开展对外交流打造国家教育名片

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外交往是我国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开展对外交流的一大特色。高校作为教育机构，自身具有文化、体育、艺术等丰富的资源优势、信息优势和组织优势，例如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合唱团、艺术团、民乐团、舞蹈团、赛艇队及计算机竞赛团队等团体机构。因此，开展教育外交不仅可以展现和传播我国自身的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软实力，还能拉近与外国民众的距离，提升国家形象，夯实人民交往基础。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拓展人文交流领域,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我国高校在向国际化转型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各方面优势,大力推动文化、体育、艺术、科技等跨国活动交流,如举办文化节和参加国际演出、比赛、交流,以此落实高校对外开放部署,推进高校国际化进程。这也是我国高校应对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的内在要求。以清华大学为例,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峰会和世界和平论坛,学生艺术团到各国去访问,与各国大学共同举办音乐会,在欧洲设立教育科研基地,这些举措为清华大学的国际化转型发挥了显著作用。

加强联合办学推动教育资源共享

开展国际高校合作、推动联合办学在国内外知名高校中非常普遍,其主要方式有课程合作项目以及合作设立高校两种。此举可以实现国内外不同高校之间教学资源共享共用,提高合作办学质量。我国联合办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并逐步深化完善。在合作项目方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早在1996年就合作设立了国际MBA项目,后又与华盛顿大学、密苏里大学等合作设立多个联合项目;在合作设立高校方面,一些境外知名高校与我国有关政府、高校等方面合作,成立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上海纽约大学等高校机构。上述联合办学成果均极大加快了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的国际化转型步伐。但是从总体上看,联合办学还主要集中于我国部分地区的少数高校,众多国内高校并未开展相关工作。下一步,我国高校应切实加强研究,重点探索引进国际知名高校资源,通过合作设立课程项目或合作设立独立大学方式,完善中外合作办学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推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合作办学质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对外工作重点任务是不断完善外交布局,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我国高校积极借鉴和利用外交方式、促进国际化转型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此,高校的管理者应尽快开展顶层设计和布局研究,加强同有关组织机构沟通联络,细化落实举措保障措施,切实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不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宇炎)

——2019年6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未来,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50%,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体量占世界的20%,是美国的两倍,比美、俄、英、法4国的总和还要多。多样化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最基本特征,是关系到我国26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怎么办的重大问题。我们要特别清醒,进入普及化阶段,不能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一个维度办所有高校;不能身子进入普及化、思想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要从同质化转向多样化。要适应学生多样化的特征,探索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办学类型、办学结构、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让高等教育异彩纷呈,培养适应和引领未来的多样化人才。要鼓励各类高校在各自定位上办出质量和水平,既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也要发展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大学;既要建好公办院校,也要关注民办院校,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要追求卓越、办出特色,为提升国家

竞争力和区域发展力提供全面支撑。

改革开放40年,发展教育、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已深入人心,教育对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已被社会所认知。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主要人才和智力支持,总体上可以依托国内高校培养,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百姓上大学的愿望已经转化为上好大学的期待,高等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受到关注、热议和重视。但在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矛盾、挑战和问题,高等教育需求已经从百姓想上大学的愿望转化为优质资源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我国高等教育体量大、需求多样,结构调整任务重,但目前存在办学趋同化现象。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多集中在原来“985”“211”等名校,难以满足社会对优质资源的需求,多样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的重要途径。例如,在法国和德国有一类培养工程师的学校,在国际排名上并不耀眼,但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特别严格,毕业生深受社会欢迎,学生和家长对教育满意。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大批这样有特色的好学校,缓解优质高等教育不足需要多样化的优质资源支撑。

多样性是物种繁荣的标志,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繁荣,就没有特色,没有特色就不能说是高质量。形成多样化的前提是鼓励大学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定位、自主管理。政府、教育、社会和舆论要形成共识,汇聚合力,更加聚焦中心、关注多样、适应普及、鼓励特色,构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和配套的评价体系。

评价是指挥棒,当其与资源配置结合时就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可喜地看到,新的评价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目前现有各类评价对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和导向作用还需要加强,受某些商业排名的强烈导向的影响,学界、社会乃至舆论,都给高校服务战略、突出特色、追求卓越的教育改革造成压力和困惑。

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多维度评价体系改革试点,通过自评与他评结合、国内评价与国外评价结合、学术专家与行业专家结合、考量知识贡献与技术贡献结合,状态数据与贡献业绩结合,考察学科水平与高校整体实力结合,重点评价高校的地位、水平和影响力,对科学发展或国家战略需求的贡献力,以及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力和支撑力,通过评价试点改革,引导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中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并为全国多样化分类评价改革提供借鉴。(作者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 赵继)

——2019年6月12日《人民政协报》

本栏目责任编辑:陈卫国